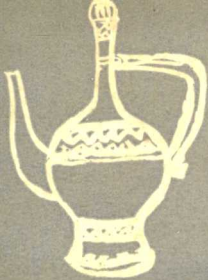


李白论探

康怀远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004

责任编辑：李 硕
封面设计：张雅男

李白论探

(1982—1992年论文)

康怀远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376号)

甘肃省金昌报社印刷厂印刷

850×1156毫米 32开本 印张 插页 400千字

1993年8月第1版 199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册

ISBN 7-5419-4800-4/G·4137

定价：10.50元

序

高海夫

《李白论探》是怀远同志十几年来研究李白所得之哀集。在它欲以问世之际，怀远同志特从祁连山下把书稿寄来，着我一读，并嘱为序。读罢书稿，回首往事，不胜欣喜，遂率意写几句读后的感想，聊以应命。

我与怀远同志相识，已是十二、三年前的事了。那次我应邀去宝鸡师范学院讲学，他还在中文系就读，即将毕业。一天，他偶来同我交谈他的学习与今后的打算。那时，他对李白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萌发了不少初步的想法，并决心日后继续从事李白研究。一个年轻人，具有如此强烈的事业心，遂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之后，他曾任教凤翔师范，又应聘至镍都金昌，岗位工作相当繁忙，研究的条件并不很理想，这是人所熟知的。然而他却孜孜不倦，不暇外慕，充分利用一切时间，一步一步地在实现着自己的宿愿，不懈地追求着在有些人看来恰如李白所说的“万言不值一杯水”的事业。在这期间我们常有书信往还，对他的工作不无了解，读罢《李白论探》，确使我有喜出望外之感。

《李白论探》共收论文五十余篇，大别言之，可分三类：其一，总论李白其人、其诗；其二，关于李白生卒、行踪及部分作品系年、寓意之考辨与探索；其三，着眼于宏观比较，考察李白对传统之因革变通及其表现之异同。对李白这样一位伟大的诗人，自古迄今，已有许多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远远不能说已经很充分了，还有许多疑点乃至空白，有待后来者去继续探索，即使前人的所得与成说，也仍需我们站在今天的高度，重新去审视，去把握，去认识。

人之愈深,其进愈艰,这是需要一点勇气和毅力,一种知难而进的精神的。这样才能有所前进,有所收获。《李白论探》中一篇篇文章,正是因为作者具有这种精神,所以才新意迭见,时有创获。

在第一类文章中,如《论李白诗歌风格》认为:由于社会的客观因素和个人命运的坎坷,李白的诗风表现出多样的发展与变化,前人只以“飘逸”二字尽括之,失之笼统。经他把李白全部作品仔细考察,其结论是:“出蜀前后主要是‘飘逸’的;一入长安后主要是豪放的;二入长安后主要是于豪放之中时见沉郁;及至晚年流放夜郎就完全成为悲壮的了。”《论李白思想》一文,对李白的思想,他既不同意说是“基本上是儒、释、道三家的混合物”(郭沫若),也不同意说他“是反映道教思想的杰出作家”(范文澜),至于“四人帮”所胡诌的“法家说”,更是自诘以下,可以无讥。他从出蜀与立志、从政与吟志、悲剧与叹志三方面详加分说,认为“李白内儒外道的思想,是他不同于其他诗人的地方,也是李白堪称李白的地方”。其它诸如《论李白的自然诗风》《论李白的豪放》《论李白的幽愤》等,意见都颇为新颖,值得注意。

在第二类文章中,如李白的生年问题,王琦据李阳冰《草堂集序》未署年月,上推六十二年,定于武后长安元年(701),今似已成定论。但他在《李白生年新证》中指出王说实误,因《草堂集序》末所署年月,乃作序时间,非诗人卒年。诗人卒年,序中另有交代,乃神龙元年(705)。这样,证之以魏颢之《序》和范传正之《碑》既无扞格,验之以李白的有关作品,又无不合,同时又解决了王琦《年谱》中的矛盾与不当处。因而,较之旧说,更觉圆通。它如对李白的陇西之行、三入长安、西涉岐邠、李杜长安相见等行踪及作品的考辨,也都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启人良多的。

自然,上述两类文章的观点、结论,并不是说都已无可辩驳了,比如关于《蜀道难》的考辨,即不无值得商榷处,但却大可备一说,对于李白研究的深化,无疑是大有助益的。至于第三类文章,或探

讨老子对李白世界观、文学观的影响,或多方比较司马迁与李太白两位异代的文学巨匠,意欲进而探寻其诞生的基础与其成长的同步轨迹,这在当前的李白研究中,也可谓生面别开,具有拓展视野作用的。

至于神话,汉大赋对李白的烛照,怀远同志均有论及,颇有发明读者耳目者。而李杜之比较研究,虽只一篇短论,却也不失为探索之一法。

综三类论文,怀远同志在出版时分别以“综合求是论”和“事诗系年探”编集,遂使“论探”全书自成体系,宏观研究之高远,微观研究之明晰,两相结合,足以见出他研究李白的思路和方法。而且据我所知,他还是先从微观起步的,所以把宏观提前者,盖其用心之构也。

我在前边说,读罢书稿,不胜欣喜,所以欣喜者,已如上述;但一想到这里出版界之种种,亦不无隐忧。这些年来,学术著作,特别是传统文史哲一类的学术著作,颇有点“运交华盖”的景象。一些研究工作者焚膏继晷,笔耕不息,而其“收获”却往往或束之高阁,或亏本出售。然而值得称道的是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李硕同志和有关负责人对出版此书帮助得力,尤其是怀远同志的学生王繁己又给以经费资助,其行可嘉可佩,加之金昌市的有关领导和党校领导均为其开放绿灯,慧眼识好书,使尽快刊行有了得天独厚的外部条件。怀远同志颇为感激,嘱我在序中一定申张。我为他有这么多的“知音”而高兴。愿天下有识之士皆如斯。

1993年写于陕西师大

基础与提高

(代前言)

有谁见过凭空而起的高楼大厦?至于“海市蜃楼”,那是大自然变化而成的虚无缥缈的幻景;它在光天化日之下,即刻便烟消云散,无影无踪了。如果我们把平时的学习比作打基础,把所取得的成绩或成果比作高楼大厦,那么就可以这样说,高楼大厦的建立,是万万离不开坚固结实的基础的。打不好基础,却企图在学习上有所提高,取得好的成绩或成果,那只是幻想中的空中楼阁,没有现实意义,或者顶多只是霎时间的海市蜃楼,供人们短暂的玩赏罢了。

1966年,我在宝鸡市长寿中学读完高中,1970年在宝鸡市金台区东风路学校当了一名教师,从那时到1978年,我先后教过小学、初中和高中的语文课,在教学过程中,我心中总是不安,感到很空虚,希望有机会提高一下。1978年,随着科学春天的脚步,我跨进了宝鸡师院的大门,在中文系开始了大学的学习生活。我象一个久饿的孩子钻进了厨房,贪婪地填充着自己空虚的胃肠;又象一株久旱的禾苗遇上了雨露甘霖,如饥似渴地吸吮着自己所需要的营养。面对浩如烟海的知识,“望尽天涯路”,我惊慌,我焦急,感到老虎吃天,没处下爪。有时也难免想入非非,企图找一条省事、轻松的捷径。但是,在科学上面哪会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听学术界很多造诣很深的老前辈们说,做学问是个苦差使,要下“笨”功夫。我想,这“笨”功夫,大概就是老老实实,一步一个脚印的意思,“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人都说牛很“笨”,学习得靠牛的“笨”劲呀!于是从读

大学的第一学期开始,我根据自己以往学习和工作的实际,结合专业课和基础课的内容,制定了前两个学年的学习计划。其中,我“约法三章”:必须全面系统地学好所有专业课和基础课;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时间“往前赶”;对自己的爱好适当照顾,吃些“偏饭”。怎样“往前赶”呢?我在保证完成学院要求的基本学习任务之外,从一年级起就提前预学二年级有关功课,以次渐进。我把这种方法叫做“左右开弓”,但又不是双手齐出,而是先“左”(眼前功课)后“右”(以后功课)。除此,还要给自己喜爱的古典文学以“照顾”。记得一年级时,我就通读了《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等,亲手抄录了《诗经选注》《唐诗选注》《宋词选注》的全本,辑录了关于《史记》《战国策》《左传》《国语》《论语》《孟子》等书许多锦言妙语。当第二学年开设古典文学课时,我已有了“似曾相识”之感了。于是,我尝到了“往前赶”的甜头。就这样,大学头两年的专业课和基础课,我都取得了优秀的成绩。

随着学习的深入,我向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能只满足于“填饱胃肠”“吸吮营养”,而应当千方百计地加强“消化”功能,即注重于独立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有一次,一位讲古典文学课的老师给我们讲唐代诗人李白。他说,历来注杜者千家,注李者寥寥;研究杜甫的名流很多,研究李白出名的不多。在座的,可以从这方面努力。“一石激起千层浪”,我思想上立即挂了个问号,为什么过去研究李白的人那么少?出于一种好奇,我从图书馆借来一套清人王琦注的《李太白全集》,课余时间阅读起来。一边阅读,一边到资料室找些资料看。发现李白诗歌的系年、其人的思想、出生地、入长安等,学术界争议很大。我把发现的这些问题作为研究的专题,进行学术研究。我首先把李白诗歌归类排队,自录成卡片;然后收集各家观点对比考究,发现问题;在发现问题之后,我把发现的问题写成学术论文。我写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关于〈早发白

帝城》写作时间问题》。论文写出后,我请有关专业老师过目。他们都说题目小,内容不错,有价值。这对我鼓舞很大。之后,我反复修改,定稿为《关于〈早发白帝城〉写作时间质疑》,《社会科学战线》在该刊1982年第4期发表了这篇论文。我第一次享受到了“就一点搞清楚”(高海先生指导语)的愉悦。从此,我把以往阅读李白全集收记的问题,根据自己的见解,统统整理成或长或短的论文。至1982年8月毕业时,完成了15万字以上的文稿,共集论文近30篇。

作了这些准备,我就着手毕业论文的写作。当时,我已对李白全貌有了大体了解,认为对李白其人及诗风应该有重新评价和讨论的必要。针对历代关于李白诗风“飘逸”的定论,我选定了《李白诗风“飘逸”说异议》这个题目,写出约1万4千字的毕业论文,被指导老师评为优秀。毕业后,看到安旗先生在1982年10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简论李白和他的诗》,第一个醒目的标题就是“不能用‘飘逸’二字概括李白的一生”。我很高兴,因为我论文中的观点跟安旗先生不谋而合。安旗先生论其人,我议其诗风,风格即人,我从中得到了很大的安慰。

毕业后,我先后在凤翔师范学校和金昌市委党校工作。我一面认真搞教学,一面继续自修古典文学。所写的论文均为报刊采用。连同在校时,关于李白的论文,已成70万字的文稿。业余的研究,促进了教学,教学的不断深入要求我不断地自修。我的教学受到了上级领导,老师和学生的一致好评。现在,只有现在,我才对古人所说的“教学相长”有了新的理解。

近几年,我在打基础、抓自修方面的体会是:打基础是个慢功,它可以给自己不断提高和深入钻研带来巨大的后劲。但它又不是一劳永逸,必须舍得花时间,摊“本钱”,全力“投资”。打基础与提高是相辅相成的,它们的关系是水涨船高。现在的提高建立在原先所打的基础之上;而将来的提高又是以现在的提高为基础的。这就是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不断提高自修的质量和效果，关键是细心整理资料要不厌其烦。一要常录卡片，做好笔记；二要注意学术动态，搞好目录索引；三是购买必要的工具书和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专业书。近10年来，我买了近2万元的图书资料。就我的家庭来说，并不富裕，经济负担虽然比较重，但我的精神是愉快的。“为伊消得人憔悴”，得到的是“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我买的书，自修管用，教学更管用。

当然，这只是自己学习的起点，我的论文写作水平还很低。《李白论探》结集出版，只是对我十多年李白研究的一个总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其中之甘苦、成败，笔者自当铭记不忘，并祈盼前辈、师长、同志、朋友不吝赐教。我决心在工作岗位上再打基础、再提高，使自己对于古典文学的钻研有更新的收获。

目 录

序	(1)
基础与提高(代前言)	(1)

第一编 综合求是论

论李白思想	(1)
论李白诗歌风格	(15)
论李白自然诗风	(27)
论李白的豪放	(47)
论李白的幽愤	(61)
论李白七绝诗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构思	(75)
论李白七律诗	(85)
论李白《古风五十九首》	(93)
论最喜爱用“白”字的诗人——李白	(109)
论元白批评李白	(116)
论苏轼褒李白而贬徐凝	(132)
论神话与李白	(145)
论老子与李白	(158)
论汉大赋与李太白	(172)
附：“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 ——李白汉赋评说之我见	(183)
论司马迁与李太白	(188)
论李杜《忆旧书怀》《北征》二诗	(211)
论李白陷狱与杜甫获罪	(218)
论李白从璘	(227)

第二编 事诗系年探

李白为什么自号“青莲”	(240)
“谪仙人”始于李白自称	(244)
李白被谗小考	(251)
李白长安相见试证	(257)
李白生于神龙元年新证	(261)
附：李白生年考异	(264)
李白东海之行和他对道教态度的变化	(272)
李白三入长安补证	(278)
李白行踪三考	(292)
李白涉岐考	(308)
李白耕田考	(316)
《早发白帝城》写作时间质疑	(320)
《蜀道难》是李白在蜀地时的作品	(324)
附：李白《蜀道难》写作时间、地点及其主题叙议	(328)
李白《清平调词》寓意新探	(337)
一曲悲歌理想的吟唱	
——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主题思想异议	(342)
李白《梁园吟》系年索辨	(349)
“揽涕黄金台，呼天哭昭王”的政治悲歌	
——李白《行路难》系年新探	(356)
李白《梁甫吟》写于渭滨确证考	(365)
《公无渡河》别解	(372)
李白《苦雨》诗系年辨误	(379)
李白《白头吟》系年析辨	(386)
三入长安的惊世悲歌	
——李白《远别离》系年探微	(392)

李白《天马歌》系年辨异·····	(400)
李白《鹦鹉洲》系年辨异·····	(405)
“驱山走海置眼前” ——漫谈李白《当涂赵炎少府粉图山水歌》·····	(410)
王夫子评李白三首绝句之得失·····	(416)
勤奋·天才·李白·····	(419)
“紫烟”“踏歌”“明镜”解·····	(421)
李白诗句解读六则·····	(427)
李白后期江夏诗辨述·····	(440)
学问“境界”漫谈(代后记)·····	(1)

第一编 综合求是论

论李白思想

李白作为一位“光焰万丈长”的伟大诗人，并不是蜚声政界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但是，实事求是地探求他的思想，对于研究其人和诗歌是大有益处的。关于李白的思想，目前学术界的意见很不一致。本文就比较流行的说法提出商榷，并不揣简陋，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复杂”说和“混合”说。

此说见于游国恩先生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二)》：“李白的一生是复杂的。作为一个天才的诗人，他还兼有游侠、刺客、隐士、道人、策士、酒徒等类人的气质和行径。……这是和他的思想复杂性分不开的。一方面他接受了儒家‘兼善天下’的思想，……另一方面他接受了道家的特别是庄子那种遗世独立的思想，……还深受游侠思想的影响。”郭沫若先生《李白与杜甫》：“李白的思想，受着他的阶级的限制和唐代思潮的影响，基本上是儒、释、道三家的混合物。”

这种李白思想“复杂”“混合”说，我觉得不够妥当，好象诗人一生复杂而缺乏主导的思想。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曾经说过，“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矛盾，它的存在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又说：

“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和决定的作用，其它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李白的一生，复杂而多变。他遍游名山大川，或访仙求道混迹渔商，或纵酒任侠。侍笔银台，待诏翰林，是他得意之时；坐系浔阳，流窜夜郎，又是他失意之日。从流离颠簸到客死当涂，李白的失意就时间而言大大超过了得意。尽管他尝尽生活甘苦，饱经世态炎凉，但那济苍生、安社稷，要为国家尽其“一割之用”的志向始终没有变。李白入长安，闯边塞，入永王幕府，以至病老而请缨从军，都是在“辛苦长辛苦，人闷还心闷”（《江夏赠韦南陵冰》）的境遇中积极寻求入世的道路。儒家提倡“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李白则是穷亦兼善天下，他明确宣布“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赠韦秘书子春》）。道家强调“遗世独立”，全身远害；李白则是时时系心民瘼，萦念国家前途，他慷慨悲吟“终夜四五叹，长为大国忧”（《江夏赠韦太守良宰》）。佛家要求清静无为，与世无争；李白则象大鹏，时欲“一飞冲天，一鸣惊人”，他急不可耐“溟海不震荡，何由纵鲲鹏”（《寄宣城赵太守悦》）。李白曾对“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侠客行》）的游侠者进行过歌颂，但也对秦武阳式的人物进行了批判：“羞道易水寒，从令日贯虹。燕丹事不立，虚没秦帝宫。武阳死灰人，安可与成功”（《结客少年场行》），并不很欣赏侠客那种急于事功和冒险愚蠢行为。很显然，李白入世道路上的步步脚印，恐怕不能用“思想复杂性”或“混合物”连贯起来，而要“全力找出”他的“主要矛盾”即主要思想影响，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李白在接受儒家、道家、佛家、游侠诸思想的影响中，“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和决定的作用，其它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

“复杂”“混合”说，不利于我们探求李白的主导思想，也无法解

释他一生积极入世、有所作为的真正原因，故笔者认为是不妥当的。

二、关于“道家”说。

此说见于范文澜先生《中国通史》第四册：“开元天宝时期，一切都达到了极盛阶段，诗也不是例外。盛唐的诗，是诗的顶峰，当时的大诗人多至数十人，其中以李白、王维及稍后的杜甫为代表。这三个诗人的诗，正是道教、佛教和儒家思想的结晶品。……李白正是反映道教思想的杰出作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二)》也说：“从他(李白)的作品和一生的行事来看，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对他发生过影响，但以道家的影响为深。”

跟“复杂”“混合”说相比，“道家”说承认了李白受主要思想影响，对研究他的思想有一定的启发。但是，这种说法恰与李白的“作品和一生的行事”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

道教思想或者道家思想，范文澜先生曾经作了全面详细的说明：“道教到唐玄宗时极盛行，它是各种思想杂凑起来的宗教，主要是神仙家思想，想永远享受饮食男女的乐趣，其次是庄周思想和佛教思想，还夹杂一些儒家思想。归根说来，道教贪求物欲，充满幻想，如果误信其说，就会使人飘飘有凌云气游天地之间意。”从本质上看，一言以蔽之，提倡出世是道家思想的核心。然而究之李白，倒是入世思想指导了他的一生。他的悲剧命运和结局，既不在于“功成”与“身退”的自我矛盾，也不在于“兼善的希望，他没有达到，独善的实际却害了他的终身”，以至“深深陷没在道教的泥沼里，直至他的暮年”(郭沫若《李白与杜甫》)，而在于李白的积极入世思想和行事与阻碍他入世的黑暗社会的尖锐矛盾和冲突。这就使得他的诗歌愈到后来就愈显得成熟、老练、深沉，个人遭遇的控诉总是伴随着对上层统治阶级的猛烈抨击，忧愤深广的心情时常发为怀才不遇的浩叹，恶世疾俗的热骂往往表现为大鹏被摧的怨恨。诗人“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的呐喊，杜甫“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

才”的抗议，白居易“不得高官职，仍逢苦乱离。幕年通客恨，浮世谪仙悲”的同情，不正道出了李白入世而不得的真谛吗？“不求小官，以当世之务自负”的李白（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怎么能说“以道家的影响为深”呢？

三、关于“法家”说。

把李白列入法家，乃是一种胡乱捏造。“比较起来，李白受法家思想影响最少；相反，在他作品中反法的言论倒是相当多。”王运熙先生《李白的生活理想和政治理想》（见《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1期）已对所谓“法家”的胡说进行了有力的批驳，恕不赘述。

四、我的认识。

李白的思想，既不是儒、释、道、游侠等思想“混合”而成的“复杂”的大杂烩，又不是“以道家的影响为深，”更不是“法家”之说的胡诌，那么如何认识李白的思想，笔者谈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从李白的出蜀与立志看其入世态度。

开元十二年(724)秋天，李白离开了养育自己的故乡——蜀地（四川），“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关于李白出蜀，有说是开元十三年，有说是开元十四年，郁贤皓先生考订应为开元十二年，笔者从之，其说详见《李白丛考》。）而远游的“心迹”李白说得很清楚。《上安州裴长史书》云：“（白）以为士生则桑弧蓬矢，射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与韩荆州书》云：“（白）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王公大人许与气义。此畴曩心迹，安敢不尽于君侯哉？”可见他那时的志向很宏大，即怀“四方之志”，理想很高远，即当“心雄万夫。”《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李白把志向理想说得很具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就是说，他要做帝王的辅弼大臣，在政治上建功立业；一旦大功告成，便效法陶朱公范蠡，留侯张良，挂冠而去，隐

遁于五湖烟水和深山白云中。李白把“事君之道”放在首位，而且一直耿耿于怀；他一生功未成，身也未退，着实为自己的最高政治理想歌唱、奋斗直至饮恨以没。这种“扬眉吐气，激昂青云”的抱负，促使着他积极地迈入人生征程，象大鹏一样“激三千以崛起，向九万而迅征”，“怒无所搏，雄无所争”（《大鹏赋》）。联系开元之际的唐代社会，李白也并不是口出狂言，耸人听闻，而是特定条件下历史的产物。一是当时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文化发达，“镇八荒，通九域，四门启兮万国来”（《明堂赋》）的唐帝国，“虽秦皇与汉武帝兮，复何足以争雄”（《大猎赋》）的开元盛世，为有识之士展现了光明灿烂的前程。二是前期帝王选贤任能，打破门第传统，从出身地主阶级中下层的士人中擢用人才，寒门张玄素、张九龄曾官至宰相，布衣马周一跃升为宰辅，又为进步知识分子开拓了希望之路。青年时的李白，虽有“仙风道骨”之称，“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感兴八首》），而且“性倜傥，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王琦《李白年谱》）；但是他“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以实现辅弼君王的壮举，远远超越了道家、纵横家、游侠等思想的规范，积极入世的态度非常显豁，儒家兼善天下、有为而治的思想在李白心灵深处是扎了根的。以往研究李白的人，常常只强调李白蜀中生活中的任侠、游仙和好道，而忽略了青少年时所接受的儒家思想的教育和熏陶。他“五岁诵六甲，”“十岁通诗书，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上安州裴长史书》），足证儒家的经典是李白的重要启蒙教课书之一，而且唐自高祖初定天下，即“颇好儒臣”，形成了“学者慕响，儒教聿兴”的局面。唐太宗尤为“锐意轻术”，宣称“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其后诸帝如唐玄宗也是崇尚儒术，他幸太学，开讲论，开元年间屡召通经人才，追封孔子为文宣王，把他捧上了帝位，以至到了代宗、文宗、宣宗更是有增无减，这种重振儒术的文教政策，不能不对李白思想的形成发生较大的影响。无怪乎他在《上安州李长史书》中这样写道：“白